

葛剑雄

陈 兼

姜义华

沈志华



苏智良

熊月之

王家范

历史 与我们的未来

沈国明 刘世军 主编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目录

葛剑雄

人口变化是社会现状的“晴雨表” 1

陈 兼

当代中美关系：正在改写历史 11

姜义华

中华文明枢轴：四次空间大扩展提升了再生力 21

沈志华

越过三八线：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战略决策 33

苏智良

中国持久抗日影响了反法西斯战争走向 51

熊月之

四不像城市：近代上海率先结缘全球化 63

王家范

七品知县如何成为被称道的“亲民之官” 73



人口变化是社会现状的“晴雨表”

葛剑雄，历史学博士，复旦大学资深教授，从事历史地理、中国史、人口史、移民史、文化史、环境史等方面研究，著有《中国人口史》、《中国移民史》、《统一与分裂：中国历史的启示》等。



人口变化是社会现状的 “晴雨表”

我们中国 13 亿人口从哪里来？从人口史角度而言，一般包含本地人的自然增长，和外地人口迁入和本地人口迁出的机械增长。比如，在公元前 2 世纪到前 1 世纪之间，祁连山一带的乌孙、月氏整体西迁，还有一些人到了朝鲜、日本、琉球、越南等周边地区和东南亚，近代以来更是遍及世界。迁入的少数民族就更多了，如今都融入汉民族，比如西汉的苏武，他的后代就是汉匈混血；白居易的祖先并非姓白，如今哈萨克斯坦一带的九个小国被唐朝称之为“昭武九姓”，一些人从其中的白国迁来，就取姓为白。

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国家，其人口都不可能来自于同一个祖先，发展过程中肯定会包容、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。因此，中国人都是“炎黄子孙”之说，只是表达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，并非人口实际构成。

一、历代人口变化的特点与意义

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，中国人口在公元 12 世纪初宋朝时突破 1 亿，到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前夕达到 4.3 亿，人口变化总体特点是增长很缓慢。

九大要素促成“两高一低”

“两高一低”是人口史上概括出的中国历史上人口变化的第一个特点，即高出生率，高死亡率，低增长率。所谓“多子多福”，也只是先人因为做不到而不懈的追求。这里分析一下九大要素的制约。

1. 古人有偶率其实并不高

一般来讲，初婚年龄越早对人口增长越有利。中国古代的法定初婚年龄，一般是男 16 岁，女 14 岁，更有低至男 15 岁、女 13 岁的。春秋战国至秦，因民众普遍营养不良而晚熟，一般是男 30 岁，女 20 岁。战乱时有特例，杜甫到今重庆奉节，有诗“夔州处女发半华，四十五十无夫家”。所以，人口的有偶率并不高。当然多妻制也是很大的因素。最极端现象是一个皇帝拥有 2 万多宫女，这些宫女的生育能力几乎都浪费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部分男性就无法找到配偶。

2. 净繁殖率受婴儿死亡率、哺乳期等影响

古代受封建思想的影响，认为孕产妇不吉利，虽无确切统计，但死亡率很高。1938 年绥远省（今内蒙古南部）的婴儿死亡率高达 429.9‰，10 个有 4 个要死亡。古人哺乳期比今天长得多，先秦时长达 3 年，有儒家学者解释守孝 3 年的说法就来源于此。北欧在工业化以前，幼儿的哺乳期也是 3 年，甚至更长。在哺乳期间一般妇女就不会怀孕和生育，这就意味着生育间隔长。有钱人雇用乳母，也减少了育龄妇女的净繁殖率。

3. 历代核心家庭人口达不到平均的 5 口

我们计算人口的家庭规模一般是用核心家庭的概念，指一对夫妻及其未成年的子女。《红楼梦》给读者的感觉是人特别多，其实是大家族的复合家庭，但如果仔细分析，《红楼梦》里的妇女基本上都是计划生育的模范。林黛玉是独女，李纨育一子，薛姨妈育一子一女，分解到每个妇女、每个核心家庭，人口都很少，有的还是无后。

古代有“五口之家”之说，西汉时，全国户的平均数不足5口，其中还包括了复合家庭。但也有特例，如刘邦刚登基时，他只有侄子和自己的子女，到西汉末年，刘氏宗室，不算嫁出去的，就有10万多人。明朝一位亲王有100个儿子继承爵位。但平均到每位夫人恐怕子女数也不多。所以，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家庭规模绝对达不到5口，规模并不大。

4. “无后为大”等观念导致严重的杀婴溺婴

儒家云，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。“后”指男孩子，女儿即便招女婿，男性上门改姓，但习俗上还受歧视。所以有时为了得到男性的“后”，就不得不牺牲女性的“后”。古时富人家并非养不起女孩，但如果一直生女孩，这支家族就要受人歧视，背后被人说祖宗没有积德。为了掩盖事实，常说生下的孩子死了。穷人家更是如此，所以中国历史上杀婴溺婴现象很严重。还有很多迷信，比如说孟尝君生下来正好和父亲同一天生日，按习俗这类孩子应该弃养。又如小孩子生下来就有牙齿被视为不宜抚养，种种禁忌导致有一些婴儿不能存活。研究人类学、人口学的专家已经发现，在原始的民族还保留这些习俗，其实是人类不自觉采取的一种淘汰机制，在供养条件有限的情况下，只能养活有限的孩子。

5. 不自觉的节育手段来控制出生率

明清两代，城镇经济繁荣、市场发达，一些市民阶层或从商人员，意识到孩子过多会影响事业和生活，便有了种种不自觉的节育手段。明朝文学家归有光纪念母亲的文章里就写到，当时妇女生吞活田螺进行堕胎，很易致死。

唐太宗曾下诏书，全国的寡妇都要改嫁，并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指标。但到宋朝就强调贞节，不许改嫁，一直持续到明清，各地建了很多贞节牌坊作为表彰，有的寡妇为了不改嫁，采取自己截发、割耳、破相，甚至自杀等等极端措施。其实是宋朝人口突破1亿，明朝突破2亿，清朝突破4亿，倡导守节对降低人口出生率有利。

6. 兵役劳役和赋税制制约人口增长

宋以前，每个男子都有固定的兵役和劳役，往往路途遥远，导致夫妻分离时间很长，直接影响生育。比如陈胜、吴广，老家在安徽、河南一带，服役地点在今天的北京。宋以后，可以以钱代役了。清朝将所有的人头税都集中到地稅里，带来了很大的解放，对人口增长有很重要的意义。

赋税制也严重影响着人口增长。汉武帝把征税的年龄提前到3岁，农民本来能多养一个孩子，但交不起人头税，造成民众“生子辄杀”，也导致户口

瞒报。

7. 严酷的刑法经常导致非正常死亡

历史上很多刑法很严酷，动不动就判处死刑。西汉，据统计，死刑率约为千分之一二；还有很多法外施刑，非法施刑的，比如说家族可以处死不孝子孙；汉初还有切除生殖器的宫刑；十国时的南汉，相当于今天广东、广西这一带，统治者认为只有太监才会忠心耿耿，造成了一大批没有生育能力的高级官员。将犯人流放到“烟瘴之地”，也会造成大量死亡。这种比例虽然没有确切的数字，但是从各种史料分析，情况也很严重。

8. 战争的间接损失比直接损失更大

大规模的战争，最后常常是几十万俘虏统统被活埋。这不能仅仅归咎于哪个统治者或者个人的残忍，实际上也有特殊性，比如在粮食供应极度困难的情况下，自己吃饱饭都成问题，何以供养几十万的俘虏呢。间接损失更大，战争中的人畜尸体没有及时掩埋，导致大规模传染病。东汉建安年间的传染病，使“建安七子”一下子死掉4个，名医张仲景家族二百余口，在这场灾害中死掉三分之二。有时战场离粮食产地非常远，宋朝的沈括曾经计算过，10万人的部队调动，如果战场较远，要60万人供应粮食。还常发生以水代兵，就是用水把你淹死了，火烧粮仓等。所以战争结束后，流行病、瘟疫泛滥，民不聊生。故而每次中国战争所造成的人口死亡，远远超出战场直接损失的人口。

9. 季风气候的不稳定造成水旱涝仍

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没有灾害，但是中国的气候有特殊性，特别是东部经济最发达、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属季风气候，季风气候的特点就是不稳定。与世界同纬度的城市相比，往往冬天比他们冷，夏天比他们热。造成中国经常是南旱北涝，南涝北旱同时发生。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年都有灾，差别只是灾情大小。水灾往往是临时的，1998年大洪水过去后，庄稼还可以种。最可怕的是历史上几次大规模、持续多年的旱灾，往往造成人口巨大损失，而且大规模旱灾往往是伴随着传染病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尽管很难计算出精确的数字，但是可以得出结论，尽管出生率相对较高，但死亡率更高，结果只能是低增长率。从公元初至1850年，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不足1‰。就是增长较快的阶段，年平均增长率也只有7‰，个别年份才能达到10‰或更高。而新中国实施计划生育前，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经接近30‰，实行计划生育之后，有些地区好不容易才把人口增长率控制到

10%以下。

人口大起大落的真相

到底中国人口有没有大起大落呢？

中国历史短期间内确有人口数量急剧下降，比如说秦汉之际、东汉末三国、两晋之际、唐末五代、金元之际、明清之际，绝对数字可以减少一半以上。又比如蒙古人灭北方的金朝，剩下人口大概不到 20%。所以中国历史上人口有时会下降到三分之一，有时下降接近一半，所以大落是绝对的事实。

但是大起的“起”是一个假象，在恢复期，人口年增长率能够达到千分之十或者十几已经不得了。但为何有大起的感觉呢？因为较长时间的一段持续增长，积累起来就是很大的数字。另外因为新朝代刚刚稳定下来，调查出来的户口往往还有很多隐瞒，或者不少人流亡未归，到太平盛世时，这些数字都统计进去了，甚至还有的出现虚报。每次赈灾时人口往往比交税时要多得多。

人口的数量变化的确是有阶段性，随着生产力、科学技术、社会保障、公共卫生各方面的进步，人口倍增的时间不断缩短。比如说公元初年，人口 6000 万左右，到宋朝 12 世纪末年，才突破 1 亿，花了 1100 年；但人口突破 2 亿，只用了 600 年；从 1700 年到 1850 年，从 2 亿到 4 亿多，仅 150 年；以后从 6 亿、8 亿、10 亿到现在 13 亿多，倍增的时间缩短了。

增长不平衡造成的恶果

以前大家都不大注意，人口增长存在着阶级、阶层和民族的不平衡。

1. 特权阶层受政策保护展开“生育竞赛”

统治阶级、剥削阶级、特权阶层，由于拥有政治和经济的特权，人口增长明显高于平均。许多人看不懂为何范进中举后，有人送钱，有人送地。作为举人，法律规定，举人本人和家人都不用服劳役，田地也可以免税。法律规定庶人在 40 岁还无男丁后代方可纳妾，但对特权阶层却没有限制。举人也不用交田税，所以不少人宁愿把田交给享受免税特权的人，因为给主人的孝敬比公家税赋要轻。宋朝优待官吏，官员子孙有世袭的特权，如一品大员，宰相的儿子可享受“正厅级”待遇，而进士们十年寒窗，不过“处级”待遇，因此引发不满。明朝规定，朱家宗室子孙世代由朝廷供养，皇帝的儿子都封亲王，亲王的儿子封郡王，第三代后封镇国将军、奉国将军等，第六代以后都封都尉。他们出生

后，名字由朝廷取，婚姻由朝廷安排，俸禄由朝廷发放，统统供养，造成皇室中展开生育竞争。西汉一朝，人口年均增长率不到千分之七，但刘邦家族从开始一对夫妻增加到十几万族人。赵匡胤“杯酒释兵权”，保证了宋朝没有战乱，但作为对交出兵权的奖励，鼓励他们买房、买地、生孩子，还规定可以赦免几次死罪，这样，造成了不同阶层人口增长率的严重不平衡。

民族之间的不平衡大多源于地理环境差异。蒙古高原、青藏高原上的民族，历来生育率偏低。西汉时，北方人不敢来江南，“江南卑湿，丈夫早夭”，文学家贾谊要去长沙任长沙王太傅，忧心忡忡，后来的确早亡。农耕与游牧民族生产方式不同也会造成人口增长不平衡，茶叶传入游牧民族后，一定程度上有益于他们的健康。

2. 中间劳力赡养比例失调引发社会混乱

人口增长不平衡造成的社会后果非常严重。正常的社会里，中间劳动力赡养老人、未成年人和丧失劳动力者，还要供养统治阶层。如果这个阶层过于庞大，就会激发社会矛盾。每个朝代的初年，统治者人丁单薄，社会的供养率较低，但后期特权阶层生育率偏高，供养压力增大，政府财政负担就不堪重负，王安石的变法就是希望改变财政，但这种和平的方式无法解决社会经济不平衡，只有战争、战乱彻底打碎旧的体系，赢得新朝廷社会供养比较合理的短暂时期。我把这种现象称为“专制社会里面不可治愈的一种人口癌症”。

到了近现代人口变化中有两次转变，从历来的高出生、高死亡、低增长，转变为高出生、低死亡、高增长。这并非单一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，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，医药、公共卫生、社会救济和保障、社会制度、物质条件各方面得到了改善，是社会总体进步的结果。实行计划生育后，又出现一个变化，转为低出生、低死亡、低增长。

二、人口思想与人口政策的关系

人口思想与人口政策是能反映社会实际现状的。清朝中期的洪亮吉、晚期的汪士铎等人，他们看到人口增长不平衡造成的矛盾，就提倡寡妇不许改嫁，部分女孩子进童贞院等等；马尔萨斯人口论传到中国后，受过西方训练的人口学家都表示赞同，如吴景超、李景汉、乔启明、孙本文、潘光旦；但是政治家不同意，孙中山一直担心中国出生率低，不利于国际竞争。而梁启超在人多有

利这一点上和孙中山一致，但反对早婚早育。

从政府层面，1941年国民政府社会部组织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，在1945年5月份国民党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承认生育节制为合法，只是因为抗战期间无法实施；1957年6月，马寅初提出了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；1964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办公室；1978年全国人代会提出降低增长率目标，新的宪法明确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。

这几年大家都在检讨，到底这个过程对不对，要不要改变？我个人认为，当时确定一孩化的目标，是不得已的选择。

我认为国策对人口政策应该随着情况的变化不断地调节。中国这样庞大的人口，急剧下降到如此程度，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先例。在考虑经济压力的同时，还要考虑伦理、家庭的习俗。孩子如果都没有兄弟姐妹，如何理解亲如手足？没有完整的家庭，如何延续家风家德呢？我于1995年就撰文提出要鼓励一胎，允许二胎，杜绝三胎。根据现在的情况，我们应该是确保一胎，鼓励二胎，特殊情况下允许多胎。台湾地区从来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，但是台湾地区人口降得可怕，所以，他们从“一个太少了，两个正正好，三个更热闹”改为“孩子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，越多越好”。

问与答

“孝道”可视为生儿育女的动力

问：随着“单独二孩”等人口政策的实施，社会抚养福利政策是否会随之调整？

葛剑雄：人口政策肯定会越来越顺应社会需要。但如果从个人的物质方面考虑，生孩子确实是负担。这个情况下，如何鼓励生育？中国的“孝道”应该起作用。传统孝道的本质是保证家庭的繁衍、社会发展。如果以此作为要求，从个人出发放弃生育，你就没有尽到对家庭、对社会的责任。由此看，生育子女其实是回报父母、回报家族、回报社会的动力。

中西文明主观上有利于人口增长

问：基督教文明和中国的儒家文明对人口结构、规模所产生的影响有哪些？

葛剑雄：基督教的观念是“一切都是上帝给的”，所以不允许堕胎，鼓励多生和领养。总体上讲有利于人口增长。中国儒家的观念认为家是根基——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、“修身，齐家，治国平天下”，总体上也有利于人口的增长。

但不能否认两者客观上都存在消极的因素，比如非婚生子女，得不到社会的认可，只有堕胎或杀婴。客观条件也会影响这些观念的实施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很强调实际的社会存在对上层建筑、对人的意识影响，包括对生育观念。比如唐朝鼓励甚至强制寡妇改嫁，原因之一就是人口不够。

自汉代已有政策手段鼓励生育

问：自汉代起有了人口登记制度，对于流浪人口如何登记？古代采取怎样的措施鼓励人口增长？

葛剑雄：从理论上讲，增加登记的指标要考虑行政成本。人口户籍调查，会尽量简化。所以一般不登记流动人口。古代有以下方式鼓励人口增长：其一，鼓励流亡人口就地入籍，或者回到原地去，就可以享受优惠政策；其二，政府组织或鼓励向一些人口锐减的地区移民，给予移民开发荒地后的所有权，改善当地生活条件。再有减免赋税，如汉代就有谁家生孩子，父亲可以免役。总的来说，古代虽然没有技术手段，但是可以用政策的办法来促进人口的增加。

人口分布疏密不均合理现象

问：当下我国西部的人口密度相对比较稀薄，国家会不会出台鼓励移民西部的政策？

葛剑雄：一个国家合理的人口分布，并不是绝对的均衡。胡焕庸先生划定的瑗珲—腾冲线是中国自然与人文条件的产物，从根本上说必要，也不可能改变。西部有些地方人口稀少很正常，没有必要人为干预。但是西部的局部地区，如重点开发的地区有必要增加人口。人口有一定的聚集效应，过于分散，对保障民生不利。比如出于供水、供电、修路、国防等特殊需要，国家给政策，鼓励人口迁入该地区。

农村“多子多福”的观念正在改变

问：中国的人口政策如果放开了，性别不均问题会不会更严重？

葛剑雄：这是观念问题，更是社会问题。如果社保政策落实了，农民老有所养，多生儿子的观念也会逐渐改变。中国台湾从来没有计划生育；韩国一直要求多生；日本有专设机构“少子化对策本部”，督促多生孩子，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并没有出现生育井喷。从我国的一些试点看，如“二胎”政策，同样没有出现“让多生就会生”的情况。相信随着改革开放，农村也会逐步改变“多子多福”的观念。我主张计划生育政策积极地调整，政策制定上应本着积极稳妥的原则，不一定全国统一，但同一地区应该一样。



当代中美关系：正在改写历史

陈兼，现任美国纽约大学 / 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体系杰出讲座教授，康奈尔大学历史学暨中美关系史研究胡适讲座教授。并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“紫江学者计划”特聘教授、美国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全球研究学者（Global Fellow）。主要英文著作包括：*China's Road to the Korean War: The Making of Chinese-American Confrontation*; *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ld War in Asia*; *The China's Challenge of 21st-Century*; *Mao's China and the Cold War*。现正完成专著 *Zhou Enlai: The Man and His Times*（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）。



当代中美关系：正在改写历史

——厘清历史恩怨的源头，迎接自身和内部的挑战

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找一种传神但不一定最准确的类比，中美关系是一种扩大版的“申花”和“上港”两支球队之间的关系，在同一空间中双方旗鼓相当又互不买账，于是情仇恩怨交织在一起。基于历史研究，我要表达关于中美关系的三点大看法。

第一，中美关系今天依然面对各种挑战，新情况层出不穷，但中美关系并没有出现危机。在可预见的将来，只要双方当中任何一方不犯大的错误，就不会、不应该出现大的危机。

第二，从历史上所谓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来看，进入 21 世纪的中美关系是人类历史未曾经历过的新型关系，既不同于“一战”之前的德国与协约国家之间的关系；也不同于“二战”之前的民主国家与侵略国家之间的关系；更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。

第三，今天中美两国面临最大的挑战，都不是来自对方，而是来自于自身和内部，都不可能通过与对方的对抗而获得解决。

所以，我把源远流长的中美关系分成五个阶段。

第一阶段 首航中国到通过“排华法案”：市场遐想生恩怨

1784年，美国人来华后对中国市场充满了遐想，但后来中美之间的接触却同美国的想象并不相符，中美之间恩怨情仇由此产生。

美国认为自己的历史有着“美国特殊性”。当“五月花”号到达美洲时，人们是抱着一种理想、一种愿景，抛弃肮脏的旧世界来到新大陆，要开创新天地，所以有“山巅之城”的自我定位。他们的理想主义又同现实主义相结合，一步步创造了后来的美国。

在面对大洋彼岸另一个大陆上的中华文明时，美国人有棋逢对手、将遇良才的感觉。美国的创国之父们对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发自内心的赞叹。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憧憬中国以农立国产生出的那种宏大的经济场景，富兰克林赞誉中国人的勤劳和人生哲学。1784年，当美国的“中国皇后”号带着一种欲望，首次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时，美国人被中国的繁荣所震惊。此行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，也使得美国人产生了关于中国市场的遐想。对于美国人来说，与中国的那些恩怨情仇，源头就来自于现实和这种遐想之间的差异。

而1784年，正是中国的盛世，清代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。

1650年清朝建立之初，中国人口因战乱从2亿骤降到了1亿多，但经历了康、雍、乾三朝，到乾隆末年达到了4亿人，一百五十年里面翻了两番，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在世界上不可比拟。

第一个条件是国内的和平，其次是从外部世界引进了新型农作物，主要是土豆、马铃薯、玉米等等，它们对水利灌溉要求很低，可在坡地发展，农业的范围扩大了，引发了所谓18世纪中国的农业革命。当然，一代人因为发展而付出的环境破坏、水土流失的代价，是需要几代人、几十代人来偿还的。同时这一百五十年间，中国出现了持续的贸易出超，铜、银大量进入中国，又为劳动力市场的扩大提供了实体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。

美国人对中国市场的遐想并没有很快变为现实，但他们又舍不得放弃中国，因为美国在当时也还是一个处于成长中的国家。从鸦片战争开始，美国人获得

了大量的机会。美国是西方对华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一部分，也是在 19 世纪下半叶在中国付出代价最小，得到利益最大的西方大国。1844 年的中美《望厦条约》在不平等条约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，它包括了构成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两个重点：第一个是治外法权，第二个是最惠国待遇。

但同时美国又是西方大国中唯一一个在中国没有势力范围的国家。1869 年，曾任驻华公使的蒲安臣，居然作为清政府的外交代表与美国政府签订了《蒲安臣条约》，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，涉及了后来成为中美之间大事件的华工问题。

华工问题，折射出了中美之间的情仇恩怨。它的产生，表面上看是中国到美国的移民问题。1848 年，加州发现金矿后，华工是美国西部大开发的生力军，但渐渐美国人对华工的看法发生了变化。对于美国来讲，种族主义永远是一个问题。在美国人眼里，华工本身也有问题。第一、不信教，第二、不融入美国社会，第三、华工压低劳务市场价格，造成不公平竞争。1882 年，美国国会通过了《排华法案》，禁止中国劳工入境，后来又一再延长。

此时，美国蒸蒸日上，19 世纪最后三十年，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，距“中国皇后”号来华已有一百多年，物换星移，美国将如何对待正处在衰落之中，似乎要被列强瓜分的中国呢？

第二阶段 从门户开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：两次大战中国站对了队伍

“二战”中，中国坚持抗日成了美国战略的一步棋，中国也成了后殖民主义时代国际规则的内在行动者。美国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，具体反映在当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两个外交照会中：第一个照会于 1899 年 9 月向“在华利益相关”的各大国提出，中国市场要向各大国平等开放，任何大国不可在中国获得排他性的、独享市场的权利；第二个照会是在 1900 年 7 月，中国义和团“拳民”围攻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，引起了包括美国的八国联军的干涉。海约翰提出，列强应当保持中国的行政和领土主权的完整。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，是美国走向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事件。之前美国基本上执行的是孤立政策，但是在门户开放之后，美国迈出了通向太平洋地区和整个世界的重要一步。

关于门户开放政策，学术界有很多批判，其中有一点是认为，美国当时已